

# 《三国演义》两个英译本中回目的翻译

陈晓莉, 张志全

(重庆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44)

**摘要:**功能派翻译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其核心理论是目的论。目的论认为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过程。文章以目的论为理论视角,对《三国演义》两个英译本中回目的翻译进行对比研究,结合实例发现:由于翻译目的和翻译纲要的不同,两位译者泰勒和罗慕士对《三国演义》中回目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关键词:**目的论;《三国演义》;回目;翻译目的;翻译纲要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1)04-0164-05

《三国演义》是中国章回体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它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其结构宏伟严密,语言简洁明快,雅俗共赏,明快生动。《三国演义》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国内可谓家喻户晓,且被翻译成60多种语言,深受广大海外读者喜爱。目前通行的120回本《三国演义》是清朝康熙年间毛纶和毛宗岗父子修订的版本,也是公认艺术成就最高的版本。

目前《三国演义》的英文全译本有两个:一个最早的译本是由英国汉学家泰勒(C. H. Brewitt - Taylor)翻译的《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以下称泰译本),1925年由上海别发印书馆出版。另一个译本是由美国汉学家罗慕士(Moss Roberts)翻译的《Three kingdoms》(以下称罗译本),1992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外文出版社联合在美国出版,1995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在中国首次出版,是目前译界最主要的研究文本。

但是,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之初,国内学(译)界对《三国演义》英译的研究还很滞后。张浩然指出:“长期以来,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却大大地落后于对《红楼梦》和《水浒传》的研究,而对其英译本的研究则更为鲜见。”<sup>[1]49</sup>据笔者从《人文与社科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检索得知,从1980年至今,国内涉及《红楼梦》英译研究的期刊和硕士论文共701篇,涉及《水浒传》英译研究的共71篇。相比之下,涉及《三国演义》英译研究的35篇,其中外语类核心期刊仅2篇。汪榕培、李正栓主编的《典籍英译研究》(第1辑)<sup>[2]</sup>是首届和第二届两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论文选集,所收论文34篇,竟无一篇涉及《三国演义》的英译研究。

周艳、周维新最早评析了《三国演义》不同译者的得与失<sup>[3]16-22</sup>,这是国内第一篇涉及《三国演义》英译研究的期刊论文。作为中国章回体小说开山之作的

收稿日期:2010-06-01

基金项目:2010年重庆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三国演义》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CDJXS10040006)

作者简介:陈晓莉(1964-),女,重庆人,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张志全(1983-),男,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人,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三国演义》,毛氏父子的版本共有 120 回,每回都有一个回目,回目是对每一回主要故事情节的高度提炼和概括,具有“画龙点睛”之效,故小说回目翻译的好坏至关重要。尽管目前关于《三国演义》英译本研究的期刊和硕士论文有 35 篇,内容涉及《三国演义》罗译本的评析<sup>[1]49-54</sup>,《三国演义》罗译本中关于文化内容的翻译方法<sup>[4]55-59</sup>,典籍翻译古雅韵味的补偿<sup>[5]71-75</sup>,文化翻译策略归因新解<sup>[6]1-6</sup>等方面,但是对《三国演义》回目翻译的研究只有两篇:张晓红,冯奇对《三国演义》回目的翻译进行了研究,重点探讨怎样才能翻译过程中充分准确地转换原语的文化意义,尽量填补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意义空白。作者通过对《三国演义》泰译本和罗译本中几个译例的评价,印证了文化意义的转换对文学作品翻译的重要意义<sup>[7]89-93</sup>。张建丽在其硕士论文中基于《三国演义》罗译本,以原著的章回标题为语料探讨了章回标题翻译的顺应性问题<sup>[8]</sup>。可见,对《三国演义》回目翻译研究的文章数量有限,视角也相对单一。

笔者拟以目的论为理论视角,对《三国演义》两个英译本中回目的翻译进行对比研究,旨在探索这两位译者分别是采取何种翻译方法翻译原文回目的,并探究其原因;同时,对《三国演义》两个英译本的研究基于一种全新的视角,旨在为《三国演义》英译本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也拓宽其英译本研究领域。

### 一、理论视角

20 世纪 70 年代,在很多西方翻译理论家还倾向于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待和诠释翻译之时,一种新的翻译理论——功能翻译理论在德国兴起,其核心理论是目的论(Skopostheorie)。目的论是德国学者汉斯·弗米尔(Hans J. Vermeer)在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创始人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的理论基础之上提出的,认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译者要根据翻译目的来决定翻译方法或翻译策略,其中翻译的目的(Skopos)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它含有三种意义:译者的目的、译文的交际目的和使用某种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通常情况下,“目的”是指译文的交际目的,那么目的从何而来?

目的论认为翻译过程的发起者决定译文的交际目的。发起者出于某个特殊原因需要译文。在理想状况下,他会给出需要译文的原因,译文接受者、使用译文的环境、译文应具有的功能以及与原因有关的细节等,所有这些构成了翻译纲要(translation brief)。翻译纲要向译者指明了需要何种类型的译文,而译者并非被动接受一切,他可以参与决定译文的交际目的,特别是当发起者因专业知识不足或其它原因对译文目的的不甚明了的时候,译者可以与发起者协商,从特殊的翻译情况中得出译文目的<sup>[9]47</sup>。

在目的论者看来,翻译是一种基于原语文本的

转换行为,而任何翻译行为都有一定的目的,产生一种结果、一种新的语境或事件。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受众——译文所意指的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的受众,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生产的语篇”<sup>[10]29</sup>。原语文本并非处于权威的中心地位,而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开放实体,为译者提供部分或者全部信息,译者选择某些信息是因为这些信息能够在目的语文化中满足某种目的。充分性(adequacy)指目的语文本应该充分满足翻译的各种要求,翻译的目的决定充分翻译所需要的对等形式<sup>[11]35-36</sup>。

### 二、《三国演义》两个英译本中回目的翻译方法之比较

《三国演义》总共有 120 回,每一回都有两句意思完整的话,即为回目,它们是对每一回主要故事情节的高度提炼和概括,具有“画龙点睛”之效。需要指出的一点,泰勒在音译中国人和地名时,采用的是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 - 1895)设计的拉丁字母标音法,如曹操(Ts' ao Ts' ao),庞统(Pang Tung)等,这是清朝末年至 1958 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中国和国际上流行的中文拼音方案。罗慕士采用的是标准的汉语拼音方案,真实地反映了汉语的发音情况。笔者比较使用的《三国演义》两个英译本分别是由泰勒翻译, Tuttle Publishing 于 2002 年重新编排、印刷的版本和由罗慕士翻译,北京外文出版社于 2008 年出版的版本。

(1)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 何国舅谋诛宦竖

泰译: An Official is Thrashed; Uncle Ho Plots to Kill the Eunuchs.

罗译: Zhang Fei Whips the Government Inspector; Imperial In - Law He Jin Plots Against the Eunuchs.

(2)第二十七回:美髯公千里走单骑 汉寿侯五关斩六将

泰译: “Beautiful Beard” Rides on a Solitary Journey; And Slays Six Men at Five Passes.

罗译: The Man of the Magnificent Beard Rides Alone a Thousand Li; The Lord of Hanshou Slays Six Generals and Breaches Five Passes.

(3)第三十三回:曹丕乘乱纳甄氏 郭嘉遗计定辽东

泰译: Ts' ao P' ei Finds a Wife; A Plan for Settling Liaotung.

罗译: Cao Pi Exploits the Yuans' Troubles and Marries Lady Zhen; Guo Jia Bequeaths a Plan to Secure Liaodong.

(4)第五十八回:马孟起兴兵雪恨 曹阿瞞割须弃袍

泰译: An Expedition for Revenge; Expedients to

Conceal Identity.

罗译: Ma Chao Avenges His Father in the Field;  
Cao Ah Man Throws Down His Coat and Cuts off His  
Beard.

由上述例子不难看出, 泰勒没有严格按照字面意思翻译这些回目, 分别省译了“张翼德”、“怒”、“馈金珠”、“千里”、“汉寿侯”、“乘乱”、“郭嘉”、“马孟起”和“曹阿瞞”, 而罗慕士则基本严格按照字面意思翻译, 没有遗漏任何信息。例(1)中, 泰勒不仅省译了“张翼德”及其鞭打督邮时的“怒”, 更把“督邮”这个官名简单译为“official”, 还把“国舅”简单译成“uncle”, 未表现出何进的皇亲国戚身份, 而罗慕士则将该回目一个信息不漏地直译了出来。例(2)中, “里”是中国特有的计量路程的单位, 泰勒将其省译, 还省译了美髯公关羽的封号“汉寿侯”。罗慕士采取直译的方法, 未遗漏任何信息。例(3)中, 泰勒不仅省译了当时曹丕纳甄氏时的背景“乘乱”, 而且省译了曹操一个重要谋士“郭嘉”, 更是将“甄氏”简单译为“a wife”。例(4)中, 泰勒不仅省译了“马孟起”和“曹阿瞞”, 且将曹操和马超大战时既割须又弃袍的狼狈行为意译为“隐瞒身份的权宜之计”, 而罗慕士则仍严格按照字面意思将该回目直译了出来。

为了更直观地看出两位译者的翻译方法, 我们可以用下表1说明。

表1 两译本回目的翻译方法之比较

译文	例1	例2	例3	例4
泰译	省译, 改写	省译	省译	省译, 意译
罗译	直译	直译	直译	直译

从表1中可以看出罗译本全部按照字面意思采取了直译的方法, 而泰译本则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翻译方法, 如: 省译, 意译, 改写, 没有严格拘泥于原文的字面意思。那么,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位译者对同一回目采取了如此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呢?

### 三、影响两位译者采取不同翻译方法的原因

威密尔认为, 任何翻译行为都有一定的目的, 指向一定的受众, 产生一种结果、一种新的语境或事件, 即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生产的语篇”<sup>[12]</sup>。翻译活动作为人类一项复杂的活动, 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 必然要受到语言之外诸多因素(翻译目的, 翻译活动发起者, 译者, 目标读者, 译文的预期功能等)的制约与影响。首先, 我们分别看看两译本各自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纲要。

#### (一) 两译本翻译目的之比较

一般说来, 翻译行为的发起者有两个: 出版机构和译者, 因此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泰勒出生于英国, 19世纪80年代曾作为海关人员在中国的上海、北京等地就职, 他翻译的《三国演义》于1925年

由上海别发印书馆首次出版。别发印书馆又称别发洋行, 是英商于1870年在上海开设的印刷出版企业, 主要经营西文书籍印刷出版。由于别发印书馆主要发售西书, 如英文教学用书、外语工具书及学校用品等, 故营业对象多为在华之外国人, 解放后因营业衰落而关闭。别发印书馆是私人开设的纯赢利性机构, 其目的在于通过出版这样一本引人入胜的小说, 来满足当时部分外国人(特别是在华的外国人)对于中华文化的猎奇心理, 获得利润。

鉴于《三国演义》泰译本成书的年代久远, 可查询的资料有限, 关于泰勒当时翻译这本奇书的初衷, 我们可以参考他在前言里说的几段话:

The San Guo is distinctly Eastern, a book adapted for the storyteller; one can almost hear them. It abounds in names and genealogies, which seem never to tire the Eastern reader or listener. Happily, English admits pronouns in place of so many strangely spelt names which ought to appear, and they have been used; and as most persons have at least a tzu (字) in addition to the hsing (姓) and ming (名) I have tried to lighten the burden on the foreign reader's memory by using only the hsing or the hsing and ming of a man, suppressing his tzu except in the case of very well-known characters.

Manchu, Japanese, Siamese, and possible other versions of the San Guo have been made, and now to these I have attempted to add one in English, with what measure of success I leave to curious readers qualified to compare my rendering with the original……

由此推断, 作为中国文化方面的专家, 泰勒当时翻译这样一部奇书的翻译目的有两个: 第一, 为了填补《三国演义》缺少英文译本空白; 第二, 希望西方读者也能欣赏到这样一部非常吸引人且具有东方特色的小说, 使他们通过阅读故事情节来满足好奇心或达到身心愉悦(即译文的交际目的)。

罗慕士出生于美国, 拥有哥伦比亚大学英文专业的硕士学位及中文专业的博士学位, 现任纽约大学东亚研究学院的教授, 教授中文、中国古典文学等。外文出版社是中国一家专门从事对外书刊宣传、编译出版外文版书刊的出版社, 担负着党和国家书刊对外宣传的艰巨任务, 半个世纪以来, 曾用多种文字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党和政府文件、马列著作、毛邓著作等, 同时还翻译出版了许多古典作品和近现代文学作品。外文出版社邀请罗慕士翻译三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 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在逐步打开国门, 接受新事物之时, 中国也希望融入国际社会, 让世界了解中国。由此可见, 外文出版社的目的是希望向现代的西方读者传递中国的文化, 让更多人了解《三国演义》, 并通过《三国演义》了解中国。

虽然罗慕士没有明确指出其翻译《三国演义》的

目的,但从他的经历及其在译本中的一段自述:…As important for Chinese culture as the Homeric epics have been for the West, this Ming Dynasty masterpiece continues to be read and loved throughout China as well as in Japan, Korea, and Vietnam. The novel offers a startling and unsparing view of how power is wielded, how diplomacy is conducted, and how wars are planned and fought; it has influenced the ways that Chinese think about power, diplomacy, and war even to this day…我们可以做出推断,作为研究并教授中国文化的专家、学者,罗幕士的翻译目的也有两个:第一,希望能将一个完整的《三国演义》精确地翻译出来,呈现在西方读者的面前,使他们能领略中国小说和中国文化的风采(即译文的交际目的);第二,希望利用在中国做交流学者研究、翻译《三国演义》的机会进一步加深学术上的造诣,即追求学术上的严谨。

由此可见,两个翻译行为的目的有共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区别。共同之处在于两位译者都是中国文化方面的专家,希望将中国这样一部奇书介绍给西

方读者;区别在于两译本的预期读者大不相同,泰译本意指的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西方读者,罗译本意指的是对中国文化及历史感兴趣的现代西方读者,且前者注重用精彩的情节吸引其预期读者,以满足他们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猎奇心理,而后者更重视通过小说对文化的传递和对中国文化、历史的介绍,两译本可谓各有侧重。

## (二) 两译本翻译纲要之比较

目的论认为,翻译纲要取决于目标语文化的情况并非原语文化的情况。既然翻译是包含原语文本的翻译行为,原语文本常常是翻译纲要的一部分。翻译纲要向译者指明了需要何种类型的译文,往往由翻译活动发起者给出,包括文本的预期功能、目标读者对象、文本使用的时间、地点、媒介和文本创作或接受的动机等。虽然翻译纲要并不会告诉译者具体采用什么翻译方法,但是译者在接受翻译任务时需要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因此,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译者的翻译方法。表2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两个译本的翻译纲要有个更直观的认识。

表2 两译本的翻译纲要之对比

翻译纲要	译本	
	泰译本	罗译本
文本的预期功能	创作一部中国小说	通过小说介绍中国文化和历史
目标读者对象	对小说好奇、愿意阅读其精彩故事情节的西方读者	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感兴趣,并愿意深入了解的西方读者
文本使用的时间和地点	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和讲英语的国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和讲英语的国家
文本使用的媒介	书籍	书籍
文本创作或接受的动机	创作一部供消遣娱乐的中国小说	创作一部中国的小说,并以此介绍中国文化

可以看出,两译本翻译纲要的主要区别在于文本的预期功能,目标读者对象和文本创作或接受的动机,这些因素和翻译目的必将影响到译者翻译方法的选择。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两位译者对同一回目采取了如此迥然相异的翻译方法。罗幕士完整而近乎精确地译出原文回目,一方面,他注重的是完整地再现原文的真实“面貌”,即将一个完整的《三国演义》精确地翻译出来,呈现在西方读者的面前,这也正是罗译本的交际目的所在,回目当然也不例外;还注重中国文化的传递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介绍,同时也追求学术上的严谨。泰勒第一次将《三国演义》英语全译本付诸于世,注重的是用精彩的情节吸引读者,他只译出每个回目最主要的故事情节,或省译,或意译,或改写那些可能会使译文预期读者一头雾水的人名和地名,用他在其前言里的话来讲,就是“我已尽力减轻外国读者记忆力所承受的负担(I

have tried to lighten the burden on the foreign reader's memory)”,他希望尽量减少读者阅读译文可能遇到的困难,以保证他们阅读故事情节的流畅性,使其身心获得愉悦,这也正是泰译本的交际目的所在,故译文显得相对简短。这样就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类似的例子在两译本中不胜枚举。二人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在回目翻译上已初现端倪,由此也可可见一斑。

当然,不同译者对同一文本采取不同翻译方法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如:译者自身的水平,原语和目标语文化地位的对比,意识形态等等。但是,仅《三国演义》原著回目而言,面对那些可能令预期读者一头雾水,或无关紧要的人名和地名,作为中国文化方面的两位专家,罗幕士选择的是严格按照其字面意思直译,泰勒选择的是省译、意译或改写等灵活的翻译方法,而后者如此处理,想必不是不懂得如何以拉丁字母标音法翻译那些人名和地名,而是故意为之,

是其译本特有翻译目的和翻译纲要要求下的充分翻译。因此,译本不同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纲要实际上构成了这两位译者对原文回目采取不同翻译方法的最重要因素。

#### 四、结语

兴起于德国的目的论突破了长期盛行于中西方翻译界的“对等论”或“等值论”的束缚和限制,将翻译目的视为翻译过程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同时,翻译纲要中的诸多因素也会影响到译者翻译方法或翻译策略的选择,启迪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者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看待和诠释翻译及翻译行为。

实际上,翻译目的的实现与否不在于使用的翻译方法,为了实现翻译目的,译者可以根据需要随时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通过以上对《三国演义》两个英译本中回目翻译的比较和分析可知,由于译本翻译目的和翻译纲要的不同,两位译者对原文回目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在回目翻译上,泰译本没有拘泥于原文的文字层面,或省译,或意译,或改写,与原文出入较大,可以将其视为其特有翻译目的和翻译纲要要求下的充分翻译;而罗译本则严格按照原文字面意思直译,并且注重传递中国的文化,近似诺德提到的“对原语文本最大忠实的模仿”<sup>[13]32</sup>。

#### 参考文献:

- [1] 张浩然.《三国演义》罗译本评析[J]. 福建外语, 2001(1): 49-54.
- [2] 汪榕培,李正栓. 典籍英译研究(第1辑)[C].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
- [3] 周艳,周维新. 评《三国演义》的英译本——兼谈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J]. 外国语,1998(6): 16-22.
- [4] 张浩然,张锡九. 论《三国演义》罗译本中关于文化内容的翻译方法[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5): 55-59.
- [5] 夏廷德,夏飞. 籍翻译古雅韵味补偿——以《三国演义》罗伯茨译本为例[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4): 71-75.
- [6] 贺显斌. 文化翻译策略归因新解——以《三国演义》Roberts全译本为例[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6): 1-6.
- [7] 张晓红,冯奇. 从《三国演义》回目的翻译看文学作品中文化意义的转换[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6): 89-93.
- [8] 张建丽.《三国演义》章回标题翻译之顺应性研究[D]. 哈尔滨工程大学,2008.
- [9] 仲伟合,钟钰. 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J]. 中国翻译, 1999(3): 47.
- [10] VERMEER, HANS J. What does it mean to translate[J]. Indian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87a(2): 29.
- [11] NORD, C.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翻译目的,译者可以根据需要随时采取不同的翻译手段手段,二三十巨著绍给西方读人了解《三国演义》,并通过《三国演义》来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Express, 2001.
- [12] BREWITT-TAYLOR C H.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M]. New York: Tuttle Publishing, 2002.
- [13] ROBERTS M. Three kingdom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Express, 2008.

## The Translation of Chapter Titles in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San Guo Yan Y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kopostheorie

CHEN Xiao-li, ZHANG Zhi-qu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Abstract:**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originated in Germany in the 1970s, with Skopostheorie as its core theory. Skopostheorie holds that a translational action is determined by its Skopos. This article, with Skopostheorie as its guiding theory, conducted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apter titles in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San Guo Yan Yi*. With instances as evidence the author found out the two translators C. H. Brewitt-Taylor and Moss Roberts differ considerably in their translation methods of chapter titles in *San Guo Yan Yi* based on their different translation skopoi and translaiton briefs, thus bringing out two totally different styles.

**Key words:** Skopostheorie; *San Guo Yan Yi*; chapter title; translation Skopos; translaiton brief

(责任编辑 胡志平)